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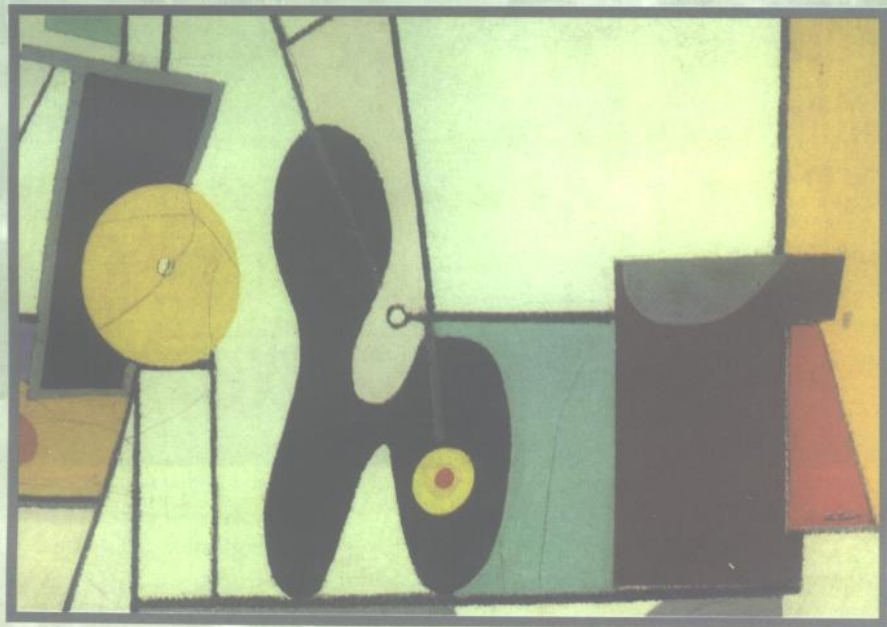
20

世纪艺术文库·研究编

杨乃乔 著

悖立与整合

东方儒道诗学与西方诗学的本体论、语言论比较



文化艺术出版社



艺术文库·研究编

悖立与整合

东方儒道诗学与西方诗学的本体论、语言论比较

杨乃乔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悖立与整合

——东方儒道诗学与西方诗学的本体论、语言论比较

杨乃乔 著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丰台区万泉寺甲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4.5 字数 600,000 字

1998年9月北京第1版 199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5039-1740-7/I·765

定 价: 39.00 元

序

乐黛云

北京大学得天独厚。一百年来，她曾以丰厚的学术传统、开放的学术视野及充满的学术生命力诱惑着许多青年学者到这里来求学。乃乔在北京师范大学取得文艺学博士学位后，到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做博士后的科研工作，这的确是他的幸运。从另一个层面来看视，这个“幸运”不仅包含这一话语本身约定俗成的意义，对我与乃乔来说，“幸运”这一话语也更意味着一种学术尝试的机会。

毫无疑问，在东方大陆学术界比较文学是一门年青的学科，我认为正因为比较文学是年青的，所以它在八十年代崛起后便毫不掩饰地亮现出自己独特的学术品格，可以说，比较文学是一门对人类智力及心态极富挑战性的学问。比较文学存在的根本价值就在于它为当下大陆的文学研究拓开了一方崭新的空间，当文学研究被封闭在某一个别民族文化体系之中时，它就不可能在多元文化交汇的景观下来充分地识别自己、鉴照自己，从而发掘自身的民族审美特色，也更不可能通过与其他民族及国家文学的相互交往，来实现在孤独状态下无法实现的潜在可能。在新世纪的来临之时，在东西方文化频繁对话的当下，最为令人恐惧的莫过于

学术视野的自守孤独了。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以来，历史证明比较文学正是由于它在学术视野上的多元性及学术心态的敞开性，吸附着众多有功底、有思想的青年学者云集于这方领域中耕耘着，我相信他们必将以自己的勤奋和思考迎来收获的季节。乃乔的博士后研究成果《悖立与整合：东方儒道诗学与西方诗学的本体论、语言论比较》的出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回应了历史。

反思八十年代以来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的发展历程，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的成立，到我国第一个比较文学博士点的建设，再到博士后流动站的设置，稚气的比较文学可谓是在历史的瞬间艰难地初步完善了自己的学科体制建设。可以说，老一辈学者及我们大家都为此投入了巨大的精力。我想只要是对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的本质投入过思考的学者都会认定，比较文学使自身命中注定必须颐养一种大度和宽容的学术心态，必须在一种坦然的敞开中拓展自己，必须拒斥出自任何目的的封闭。这才是比较文学的生命力所在。多年来，我们的心愿就是想把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办成与国际学术界交流及对话的窗口，可以说，做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但也是很不容易的。说到“重要”，当下中国已打破了封闭的经济模式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了，那么学术意识也应该与此同步，我们不应该苟活在现代高科技文明与文化保守主义的夹缝中来承诺自己的学术良心，我们应该秉有一种勇气敞开自己的视界去看视一下西方的学者正在做什么？正在思考什么？同时也应该让西方的学者了解东方大陆的学术传统，促成东西方学者在“和而不同”的原则上展开广泛与平等的对话。说到“不容易”，这种国际性的学术行动，不仅需要我们克服语言、文化的障碍，还需要以我们自身的学术实力及学

术真诚赢得西方学者的尊重。可以说，我们所投入的一切努力并不是为了奏效于我们这一辈人自身的学术利益，而是为了当下那些学术生命力旺盛的青年学者构筑一个与西方学术界对话的平台，让他们在国内学术界崛起，让他们的学术在当下或未来走向国际学术界，而获得西方学者的尊重。一言以蔽之，能够在“比较所”培养一批从事比较文学方向研究的专业青年学者是我们多年的宿愿，并且这一宿愿已远远超越了我个人在学术上成功的欲望。我说乃乔到“比较所”来做博士后的科研工作，对于我和他来说都是一个幸运的机会，其深层的内涵正是隐喻在这样一种学术愿望及学术背景之下的。

多年来，无论是在国际学术界还是在国内学术界，比较文学研究的理论性倾向日益增强，比较诗学的跃起成为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一脉主潮，比较诗学对于那些具有思辨性与体验性的青年学者有着极强的诱惑力。乃乔到“比较所”来做比较诗学的课题研究具有很好的学术条件，他攻读硕士学位时，钻研的是中国古典文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时钻研的是文艺学专业，那么，到北京大学“比较所”来汇通、整合他在硕士与博士期间积累下的东西方文学知识，这是他命中注定的必然了。在两年的博士后研习期间，乃乔的刻苦用功、博学深思是众所周知的。《悖立与整合：东方儒道诗学与西方诗学的本体论、语言论比较》一书就是他这两年研究的结晶，我想，这部厚厚的专著应是国内第一部出版的文学方向的博士后论文。

在东方汉语语境下，究竟应该怎样从事比较诗学的研究？这是我多年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和“比较所”的研究生及青年学者一起来进行学术上的尝试，我认为这是非常有价值的。在东方

汉语语境下从事比较诗学的研究，当然要解决本土诗学与本土文学的问题，也就是要回答中国古典文论与中国古典文学界所提出的或正在解决的问题，因此这一学科要求研究者应该秉有扎实的国学功底。但它又执著于以一种国际性的学术视野，在敞开中来反思、观审自身的文论与文学现象，这也正是我所说的“比较文学正是提供了一种用别人的眼光来审查文学自我的可能。”（《比较文学原理》乐黛云著，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当然要“用别人的眼光来审查文学自我”，这也要求从事比较诗学的研究者非常熟悉西方文艺理论思想，即从古典的到现代的，再到后现代的各种理论思潮。可见，从事比较诗学研究者，其在学术的知识结构上要求是比较苛刻的。关于在东方汉语语境下的比较诗学研究到底应该怎样做，我不想多谈，我们的许多构想及尝试均呈现于乃乔的博士后论文中，究竟是成功还是平庸，请学人们在阅读中反思自己的知识背景及知识结构再去评判。

九十年代以来，关于比较文学与比较诗学方法论的讨论很多，我认为我们更应该扎扎实实地投入到具体的比较文学与比较诗学研究中去，以自己的勤奋及优异来获取切实的成果。在这两年中，乃乔对中国古典诗学的若干基本问题进行了穷尽性思考和相当深入的阅读。特别是对于东方的儒家诗学、道家诗学和西方的形而上学诗学、后现代解构主义诗学，在广阔的时空语境中展开了广泛联系的创造性思索，发现了其中冲突与互补、悖立与整合的逻辑结构，推出了许多前人未曾提出的看法和问题。当然，这些看法和对问题的回答要得到学术界普泛的认同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讨论或更多的时间，但这些论点和问题的提出无疑具有深刻的启发性，为促进其他学人的思考，开辟了新的学术研究空

间。我想这部著作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从本体论和语言论的原初意义上对中国诗学和西方诗学进行了古今中外、纵横交错的比较研究，其涉及问题之复杂，引用材料之丰富，论点展开与结论导出之难度都不仅需要充分的学术准备和学术功底，而且需要顽强的学术勇气和毅力。当今比较诗学的本义就在于将存在于一种文化的诗学置于其他多种文化诗学的脉络中，加以考察和鉴别，借“异质”的反照以识其本相，并彰显其独特之处，为解决世界诗学面临的共同问题做出独特贡献，而促进其发展。乃乔的博士后论文正是沿着这一路径，作出了极有价值的开拓。

事实上，东西方诗学都是建立在各自的哲学体系上的。其各自不同的文学观必然受到其本体论的制约和规范。中国儒家以具体阐释和实践伦理道德为特征，较少谈到抽象的“本体”问题，前期儒家更是如此。关于什么是儒家的本体论至今讨论得还远远不够。乃乔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认为儒家诗学皈依于“经”。“经”既是一个本体范畴，又是一种以语言文字凝固成的文本形式。他从“经，元一以统始”（刘歆：《三统历》），“经者，道之常也”（《朱子语类》），“经，常道也。其在于天谓之命，其赋于人谓之性，其主于身谓之心”（王阳明：《尊经阁记》）等多方面论证了“经”正是儒家哲学安身立命的本体，足以和作为道家哲学本体的“道”，作为西方哲学本体的“逻各斯”相提并论。在语言论方面，本书通过儒家诗学的“立言”，追求不朽，通过道家诗学的“立意”，追求“言外之意”和“得意忘言”，以及两者之间的对立和互补，论述了中国古典诗学的发展，并在与西方诗学语言论的比较中，得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发人深省的结论，显示了作者高强的思辨能力和学术水平。东西方诗学的比

较研究需要一种大文化意识，乃乔在讨论儒家诗学与道家诗学的悖立与整合时，始终是把自己的思考置放在经学、玄学、理学与心学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在讨论西方后现代解构主义诗学时，又始终是把自己的思考置放在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形而上学诗学体系下展开的。这部厚重的比较诗学论文绝对不是把东西方诗学发展历程上的某一个别范畴及概念拿过来，进行你有什么我有什么的孤立比较研究，而是把东西方诗学共同置放在跨文化的学术思考平台上进行整体的、也即体系上的比较研究；因此论文不仅着重于跨文化的东西方诗学体系的外部比较，同时又给出了中国古典诗学体系的内部比较，当然这种内部比较也是参照于跨文化的学术视野之下完成的。

关于本书的具体观点及逻辑构架，我在这里不做多过的介绍，我相信对比较文学、比较诗学、西方文艺理论、中国古典文论与中国古典文学曾投入深刻思考的同仁，一定会从这部专著中找到共同的兴趣、共同的领悟及共同的话语表达，或找到一种启示。比较诗学在东方汉语语境下不仅要介绍西方诗学的各种文化思潮及理论内涵，也更需要在一种跨文化的反观下有效地解决中国古典文论与中国古典文学领域中的问题，这其实也是为中国古典文论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寻找新的思考途径及新的方法论，并最终以前相当的说服力把这种新的方法论转换为学术研究的本体论。

尝试在本质上从来就比因循守旧更有价值且精彩得多，尝试就意味着兼有选择与成功的可能性。乃乔在尝试中推出的这些很有创造性的思索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这本书的许多部分两年来已经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战线》、《文艺争

鸣)、《东方丛刊》、《人文杂志》、《文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学术研究》、《天津社会科学》、《浙江学刊》、《江海学刊》等重要学术刊物。在已发表的 16 篇长文中,几乎全部已为《人大复印材料》所转载。关于这部博士后论文的学术价值还是让学术界来评说,但我坚信这本博士后论文的出版必将为 21 世纪比较诗学的发展揭开崭新的一页。

1997. 10. 1.

序

童庆炳

杨乃乔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完成博士论文并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又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所完成了博士后课题的研究工作，他的专业基础极好，治学也刻苦，在长期艰苦的生活和研究工作过程中，他终于如愿以偿，拿出了这部在学术上具有前沿性的新见迭出功底扎实的著作。当他把这部著作摆在我的面前的时候，作为比较了解他的人，我是充分地感受到它的分量的。我相信如果可能的话，他的著作的每一页，都是可以“拧”出他的“苦涩”而又“畅快”的汗水的。说“苦涩”，是因为杨乃乔在北京的这些日子是充满着苦涩的愉快。我的这些话，也许只有乃乔自己才能体会它的内涵。想做一位学者也是不容易的。

当前，比较文学以“显学”的态势跨越了国别文学研究的界限，走向了学科发展的国际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比较文学在国际学术界的崛起，顺应了新世纪到来之前东西方文化相互看视、相互对话的历史潮流。从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的内部走向来看，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又是朝着理论化方向行进的，理论化推动着各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者从文学理论的思辨层面来诠释多元文化语境下的文学文本，正如耶鲁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保罗·德·曼

所言：“比较文学研究的核心无疑是理论。”因此，比较诗学的崛起也同样顺应了比较文学研究内部发展的主导倾向。可以说，比较诗学在比较文学的领域中有着相当的前沿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杨乃乔博士的《悖立与整合：东方儒道诗学与西方诗学的本体论、语言论比较》的构想、撰写与出版，正是在东方汉语语境下对国际比较文学研究之理论主潮的一种推进，它的学术意义将会随着比较文学的发展日益显示出来。

一百多年来，比较文学实际上是在一种沉重的学科危机感中发展着自己，因为至今关于“什么是比较文学”的本质性设问，就是国际比较文学界自身也没有找到一个具有权威性的回答。与其无休止地争执于这一本质性设问，不如具体地走向比较文学研究，去做一次具体的研究工作。在大陆比较文学界存在着这样一种令人困惑的现象，讲授比较文学概论的学者与具体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似乎是在两条截然不同的路数上发展着自己，那些讲授比较文学概论的学者在侃侃而谈比较文学的性质、方法与历史时，可能拿不出一篇象样的关于比较文学研究的文章，其实，比较诗学也是如此。无论是比较文学研究还是比较诗学研究，均需要具有东西方相互对话的国际性学术视野，并且也更需要跨东西方文化的学术功底。奢谈“比较文学或比较诗学应该如何如何”，这充其量也就是比较文学或比较诗学研究中的避实就虚而已。杨乃乔的《悖立与整合：东方儒道诗学与西方诗学的本体论、语言论比较》没有空谈比较文学和比较诗学的研究方法论，而是切实地进入东西方两种文化语境，把自己的思考置放在实实在在的诗学与文学的研究上。杨乃乔的著作在这方面所作出的切实的努力，可以说体现了一种求实的学风，是难能可贵的。

亨利·雷马克认为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无论这个定义是否具有权威性，一百多年来比较文学的发展告诉我们，比较文学的根本意义大概永远不在“比较”这一词汇的原初意义那里呈现这一门学科的价值，而在于以一种国际学术视野对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现象进行跨文化的相互对话，也更在于以当前的学术视野对古典文本进行新的阐释，从而以新的阐释给予古典文本以新的生命力。《悖立与整合：东方儒道诗学与西方诗学的本体论、语言论比较》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展开自身研究的。作者对东方儒道诗学与西方诗学的相互对话是在两个比较的层面上铺开的，作者不仅从本体论与语言论的高度对东西方诗学做了体系上的比较，同时也在东方中国古典诗学体系下对儒家诗学与道家诗学也做了本体论与语言论上的比较。因此，西方诗学的本体范畴“逻各斯”与东方儒家诗学的本体范畴“经”，西方诗学的本体范畴“逻各斯”与东方道家诗学的本体范畴“道”，东方儒家诗学的本体范畴“经”与东方道家诗学的本体范畴“道”，这三个本体范畴在互为鉴照的比较下，被作者重新诠释出它们自身本在的原初意义。如果说，“逻各斯”、“经”与“道”是西方诗学、东方儒家诗学与东方道家诗学各自安身立命的终极，那么，西方诗学与东方儒道诗学在本体的终极上建构的文学价值取向，也正是在这三个本体范畴的相互对话与比照中显示出来。美国学者勃洛克认为比较文学是一种坚定的从国际角度从事文学研究的设想，在这一设想下展开的比较文学研究必然要求两种学术话语的沟通。当然，我们不仅应该寻求双方都可能接受的理论话语及言谈规则，也更应该讨论东西方诗学栖居与发展的话语体系。因此，对东西

方诗学语境的讨论也是《悖立与整合：东方儒道诗学与西方诗学的本体论、语言论比较》重要的涉入点。作者指出西方诗学栖居的拼音语境是写音语言，是声音使意义出场，同时也指出东方儒道诗学操用的汉语是写意语言，是书写使意出场。作者的这一见解，即西方诗学的写音语境与东方诗学的写意语境的界分，可以肯定在学术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为学术界从语言切向本体而讨论诗及诗人的安身立命提供了重要的学术价值。为什么西方诗学固执于语音中心论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为什么东方儒家诗学固执于书写中心论的经学中心主义？为什么东方道家诗学在本体论的意义上主张反“立言”，以毁灭经典文本而拒斥儒家诗学的经学中心主义？为什么西方后现代主义诗学与东方道家诗学从各自的语境在解构各自诗学历程中的中心主义时，于本体论上能够达成共识？这些设问及困惑都可以从西方诗学的写音语境与东方诗学的写意语境之界分中给予澄明的回答。作者花了很大的力量来论证这个命题，无疑是很高的学术价值的。

杨乃乔博士的《悖立与整合：东方儒道诗学与西方诗学的本体论、语言论比较》不同于以往的比较诗学专著，它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对东西方诗学的外部与内部做体系上的比较研究，而不是做一个个诗学范畴之间的比较研究。这种东西方诗学体系上的比较给作者的研究提供了相当的难度，同时也要求作者在知识结构及理论素质上有着良好的学院派训练。正是这种体系之间的比较思维使作者的视野不仅仅局限在诗学的层面上，而是透过诗学的表象去发掘规定诗学形成的更深层的东西，因此，作者是从哲学的维度去透视西方诗学的生成与发展，从经学的维度去透视东方儒家诗学的生成与发展，从玄学的维度去透视东方道

家诗学的生成与发展，又从理学与心学的维度透视东方儒道诗学的冲突与互补。这种诗学体系之间的比照性思考使这部博士后论文的撰写在一种可比性中延伸，而没有那种把范畴从学术文化的背景中孤立出来，进行范畴与范畴之间所谓生拉硬扯的“比较”。对比较文学研究的可比性追寻不仅是一种方法论的问题，也更是研究主体的知识结构与学术视野的问题。说到底，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比较诗学不是诗学比较，它要求研究主体秉有一种恰如其分的东西方文学及诗学互为看视的内在学术通透性。在一部比较文学或一部比较诗学的专著中，这种内在的学术通透性之存在是不言而喻的，对于从事比较文学或比较诗学的研究者来说是极为重要的，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篇》和《谈艺录》正是在这一点上赢得了学术界学人的广泛尊重。

反观当下西方比较诗学研究的现状，西方诗学往往偏执于自身的理论，或偏执于一种理论与另一种的研究，而忽视对文学文本的透视和读解。任何理论在体系上的成功与自治最终应该指向文学现象，使自身在文学现象的读解中奏效；《悖立与整合：东方儒道诗学与西方诗学的本体论、语言论比较》正是在调整了这一偏执上，把关于东西方诗学的理论性思考落实在文学现象与文学思潮的层面上，使自己的研究不失于空谈理论。作者在讨论为什么中国古典文学与中国古典诗学于魏晋时期走向自觉时，在讨论中国古典文学的隐逸精神时，在讨论儒家诗学的经学中心主义时等等，都把自己的理论追踪与具体文学现象的层面的分析适当地结合起来。

西方比较文学界存在着“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等流派之争，东方大陆比较文学界倡导的“中国学派”在某种程度上顺

应了当下世界文化多元共存的格局。如果把文化相对主义这个概念带到大陆比较文学研究圈子内来看，在一种普泛的意义上应该认定、成立两种语境下的比较文学与比较诗学的研究，即西方欧美写音语境下的比较文学研究与东方大陆写意语境下的比较文学研究。一位栖居在东方大陆汉语语境下的比较文学研究者，无论是用东方汉语的书写还是用西方拼音语言的书写来企图解决西方欧美文学与诗学的根本问题，都似乎有点隔靴搔痒。因此，栖居在东方大陆写意语境下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应该把自身思考的着眼点置放在解决本土文学与本土诗学的基本层面上，并且其所解决的问题能够引起东方大陆那些纯粹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与中国古典文论之学者的注目，这样才能够使这门学科在大陆学术界不受指责，从而使这门学科拥有一定的在东方大陆学术空间生存下去的学术地位。一位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首先应该是一位优秀的本土国别文学研究者；在国别文学的学科意义上，倘若一位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缺憾本土文学研究的起码学术功底，他又应该怎样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呢？可以说，杨乃乔的《悖立与整合：东方儒道诗学与西方诗学的本体论、语言论比较》由于作者的本土文学的功力深厚，在这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儒道诗学”与“东方儒道诗学”，这两个概念的两字之差，在一种深刻的维度上已经反映出作者的国际性学术视域。“儒道诗学”是东方大陆本土的纯粹中国古典诗学研究者所起用的概念，也就是国别文学研究者所起用的概念。而“东方儒道诗学”是东方大陆本土的拥有多元文化学术视野的学者起用的概念。“东方儒道诗学”的成立较之于“西方诗学”，两者在国际学术的价值天平上等量相称，其本身就潜在地带有对一

百年来比较文学研究中西方中心论之偏见的挑战与蔑视。当然，对西方中心论之偏见的挑战与蔑视并不等于以东方中心论逼使西方中心论隐退，以一种边缘与中心的替换使“东方儒道诗学”这一概念充斥着民族沙文主义的内涵，而是使东方与西方在诗学的层面上平等地对话，在互为鉴照中给予各自语境下的文学文本之阐释注入新的生命力。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艾田伯认为比较文学必须冲出欧洲中心主义这个狭小的视域，走入东方，特别是走向中国文学，这样才可能给比较文学注入崭新的生命力。不错，西方之比较文学学者尚且如此以为，那么，栖居在东方大陆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又为什么不能冲出欧洲中心主义的狭小视域，给东方大陆本土的文学研究注入崭新的生命力呢？一位东方学者在东方大陆本土步西方中心主义的后尘，总是以与西方的学术关系及西方的理论话语来装饰自身的学术品质与心理文明，把自己打扮成一位与西方某种学者平起平坐的后殖民主义者，这是东方大陆学术界的悲剧。那么，东方大陆本土这些从事国别文学研究的学者，为什么又不能冲出纯粹中国古典文学与纯粹中国古典诗学研究的民族视域，把自己的学术视野投向西方，在自身已有的国学功底之下以某种程度的“他者”视野重新反观、诠释东方大陆的古典文本呢？文学的民族性既是伟大的，又总有其局限性，这是一个文化上的二律背反。一位学者无论在学术视野上是偏执于西方还是东方，拒绝接受其他民族的文化精髓，在骨子里，他无疑是一位狭隘的庸人。反思东方中国近现代学术史，那些能够在当代学者的尊重中留下足迹的大学者，在其知识结构中都具有学贯中西和学贯古今的功底，如王国维、胡适、辜鸿铭、吴宓、冯友兰、钱钟书。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些喝足了洋墨水的洋博士、